

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见证者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留苏学生的历史考察

游 览

〔摘要〕20 世纪 60 年代中苏关系的恶化,使得双方在“蜜月期”的各种合作逐渐蒙上了意识形态冲突的阴影。而此前作为中苏友谊与合作产物之一的中国留苏学生,此时也面临着尴尬的境地。根据来自国内的指示,他们除了要继续学业,还必须顶住苏联政府的压力,战斗在“反修”斗争的最前线。而随着中苏分歧的不断扩大,这些青年学生被赋予的政治使命逐渐超过了其学业的价值,其自身也成为中苏关系从恶化直至破裂的历史见证者。

〔关键词〕留学生;修正主义;意识形态;中苏关系

〔中图分类号〕D232; D829; 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4)-10-0060-11

The Witness of the Split: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Soviet Un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ino-Soviet Conflicts

You Lan

Abstract: The deteriorating Sino-Soviet relations in the 1960s' gradually casted a shadow of ideological conflict on their various cooperation during the honeymoon period. As one of the product of the Sino-Soviet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the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Soviet Union were also facing a growing complicated situation. According to internal instructions, in addition to continuing the studies, these students must stand up to the pressure of the Soviet Government and fight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struggle against revisionism.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Sino-Soviet differences, these young students were instructed to place more efforts in political struggle and eventually became witnesses to the split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作为中苏双方庞大合作计划的一部分,从 1951 年开始向苏联派遣的中国留学生一直被视为社会主义国家间牢不可破的友谊的象征。至少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无论是在高层还是民间,中苏双方一直都将这些身处异国他乡的学子作为亲密无间的中苏兄弟关系的明证而不遗余力地加以称颂和宣传。^①然而,事实证明,这一过分倚重“友谊”的合作计划注定要同中苏关系的命运紧密相连,经历波澜和曲折。

1957 莫斯科会议是中苏分歧的开端,^②尽管此时双方领导层仍在有意识地通过妥协避免给尚处于“蜜月期”的两国关系带来冲击,但一些微妙的变化已经在若干方面显露出来。一

① 关于对中苏关系“蜜月”时期留苏生涯亲历者的回忆,可见邓守强《留苏岁月》,东北大学出版社,2007 年;单刚、王英辉《岁月无痕:中国留苏群体纪实》,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年;欧美同学会留前苏联与独联体分会编《学子之路:新中国留苏学奋斗足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年;朱训主编《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忆留苏岁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年;朱训主编《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忆留苏岁月(下编)》,中国计量出版社,1997 年等。相关问题的学术研究成果,可见张柏春等《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年;马意莉《两个革命之间: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参见沈志华、李滨编《脆弱的联盟:冷战与中苏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周尚文《新中国成立初期“留苏潮”评述》,《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 年第 10 期;曹强《试析中苏关系对建国初期留苏学生派遣的影响》,《理论视野》2010 年第 2 期等。

② 参见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205 页。

个突出的表现就是：1956年以后中国留苏学生的数量不断减少^①，而1960年中苏意识形态矛盾的公开化更使得这一趋势骤然加剧。^②关于留苏人数锐减的原因，中方一度在公开场合和文件里将其解释为通过减少数量以提高质量的需要^③，但另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来自苏方的种种异样态度和做法早已引起了中方的注意。1959年以后，诸如日益缩小接受中国留学生专业范围、限制中国留学生专业学习、加强对中国学生的监督和控制等现象开始频频出现在中国驻苏使馆发往国内的情况汇报中。^④而令中方更为警觉的是，苏联相关机构和人员试图影响中国留学生思想的行为也日趋频繁。特别是在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从苏联传回的种种信息表明，苏方正在通过课堂教学、个别谈话等多种途径，积极向留学生“灌输修正主义思想”、甚至对其进行“拉拢、利诱，动员他们留居苏联”^⑤。并且，中方主管部门也不得不承认，在“国际修正主义”的侵蚀和策反下，留学生在政治思想、男女关系、组织纪律等方面发生错误甚至叛变并非个例。^⑥

由于中苏两党分歧日益扩大给中国留苏学生带来的影响不断增强，中方开始着手修改原先在留学生管理方面的一些思路和方法。其中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对留学生政治思想教育的内容进行重新定位，并将其提升至与学业要求同等重要的地位。关于留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长期以来，包括1958年召开的第一次留学生工作会议的观点是着重防止留学生中出现大国主义情绪和个人生活作风问题，但这显然已与1960年中苏关系的现实脱节。因此，中国政府做出重大调整：从1960年夏开始，组织留学生分批回国接受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教育，确保留学生的思想同国内保持一致。^⑦很难说这一花费甚多的强制性措施在当时帮助中国留学生抵制苏联影响的实际状况中究竟发挥了多大效用。绝大部分中国留学生此时并没有、也无法去揣摩中苏龃龉的真正原因，甚至很多人直到很晚才意识到中苏高层存在的紧张关系。^⑧除了少数较为积极的学生干部外，大多数人此时所做的只是遵照上级的指示，并将身边发生的各种状况及时反馈回去。尽管在

苏共二十二大后中苏新一轮的意识形态斗争已经不可避免，其间也曾出现由于中国留学生的“不友好”行为引发的外交纠纷，但在60年代初期，中方对于留苏学生的指导工作仍然十分谨慎。即使是面对来自苏方的一些刁难挑衅，中方也更多的是强调“讲究策略”，以避让为主，“不与纠缠。避免为其抓到某些借口”。^⑨针对留学生可能参加的一些集会活动，中方更是指出要“照顾同苏联方面的团结”，要求将“避免中苏双方在会上发生争论”作为今后留学生在此类活动中“必须坚持并贯彻”的原则^⑩。这种看似让步的做法表明，此时的中方决策层并不愿看到中国留学生们过多地介入中苏间的争执，从而刺激到已经十分敏感的双边关系。

1963年是中苏两党规模空前的意识形态大

- ① 参见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21—222页。
- ② 至1961年，中国留苏学生人数从上一年度的317人锐减为71人。参见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第223页。
- ③ 参见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第171页。
- ④ 参见中国驻苏联使馆《苏方对我留生态度及对我国国内情况的反映》（1961年2月2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010—01；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苏联对我留学生进行限制、刁难、围攻等情况》（1963年1月18日—1963年9月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2555—01。
- ⑤ 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苏联对我留学生进行限制、刁难、围攻等情况》（1963年1月18日—1963年9月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2555—01。
- ⑥ 《中央关于派往国外留学生管理教育工作的两个文件》（1963年11月4日—1964年3月1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477—01。
- ⑦ 经周恩来批准，1960年10月25日起，留学生回国参加政治学习的频率从每两年一次改为每年一次。参见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第171页；朱训主编《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忆留苏岁月（下编）》，第443、444页。
- ⑧ 参见沈志华、李滨《脆弱的联盟：冷战与中苏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87页。
- ⑨ 中国外交部《告我留学生对苏联共产党第22次代表大会表态事》（1961年10月30日—1961年12月1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2989—02。
- ⑩ 中国外交部《关于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参加外国留学生发起的集会事》（1961年1月26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010—04。

论战的开始，也是中方对留苏学生的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一年。在“公开展开争论，是有益无害的”思路下^①，已决意同苏共争夺马列主义意识形态解释权的中共相信，开动一切必要的宣传机器来扩大自身影响，争取并团结全世界左派力量的时机已经到来，而能够接触到各国留苏学生乃至苏联普通民众的中国留苏学生，逐步显示出能够在境外宣传中方理论主张以及回应苏方攻击的有利条件。中国国内原先对留苏学生行为举止的保守态度由此出现松动，甚至在反修斗争中的政治思想表现也被列入选拔留苏学生的重要标准。^②

于是，从1963年初开始，苏联多个高校学院陆续发生因中国学生散发小册子而引发的纠纷。这种由中国留学生选译自《人民日报》或《红旗》杂志的反修文字材料被有意放在公共场合，让人随意取阅。^③这一简单有效的宣传方式很快得到相关部门的肯定和提倡。^④尽管苏方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并多次向中国学生提出警告，但来自领导层的政策支持使得留学生的中方主管部门对苏方的反应嗤之以鼻，并要求“充分利用当前有利形势”，“采取更为积极放手的态度，千方百计的通过各种途径向外传播我反修小册子和我党立场观点”^⑤。这种大胆鼓动，无疑是在配合国内全面铺开的反修宣传运动，同时也是对留学生角色身份的一个重新界定。意识到留学生在对外宣传活动中的价值的中方领导层对此也颇为满意，外交部和总参二部的指示在鼓励留学生要“理直气壮”地继续推进反修运动的同时，还信誓旦旦地向他们保证：这种活动被苏联人“发现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⑥，因为针锋相对的斗争只会“更加暴露苏修集团的胆小如鼠的本来面目”^⑦。

来自国内领导层的指示和上级的鼓励的确激发了留学生们的政治使命感。这些原本就具有较高政治素质的留学生经过理论学习，普遍接受“苏联共产党变修了，而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是坚持马列主义的”观点^⑧，并丝毫不怀疑积极完成组织上布置的各项任务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因此，他们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反修宣传运动中。^⑨而当苏方试图劝阻他们的宣传活动时，这些留学生通常会表现出强

烈的对立情绪和坚定的斗争立场，并尽其所能地利用程式化的官方理论进行辩护。即使是面对自己的领导和导师，他们也会毫无顾忌地加以驳斥，甚至是发起带有挑衅意味的攻击。^⑩尽管苏方教员曾多次提醒留学生们要把精力更多地集中在业务学习上^⑪，但此时的中国学生，已然褪去了温文尔雅的书生气，代之以用充满火

- ① 参见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第368页。
- ② 参见朱训主编《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忆留苏岁月（下编）》，第452页。
- ③ 从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尚未发现有关中方对于留学生此类活动的明确指示。但从中国驻苏联使馆相关电报中可以看出，包括使领馆、留学生、劳工、华侨等在内在的在苏人员都被要求或安排进行此类传播工作。参见中国驻苏联使馆《驻苏联使馆对两所苏联高等学校就所谓散发小册子对我留学生提出警告一事提出的对策及外交部的指示》（1963年3月23日—1963年4月1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338—01。
- ④ 据中国驻苏联外交机构的情报反映，此类小册子在苏联普通民众和外国留学生中颇受欢迎。参见中国驻苏联使馆《苏联各院校找我留学生谈话阻止散发小册子的情况》（1963年3月28日—1963年4月3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338—03。
- ⑤ 中国驻苏联使馆《驻苏联使馆对两所苏联高等学校就所谓散发小册子对我留学生提出警告一事提出的对策及外交部的指示》（1963年3月23日—1963年4月1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338—01。
- ⑥ 中国驻苏联使馆《驻苏联使馆对两所苏联高等学校就所谓散发小册子对我留学生提出警告一事提出的对策及外交部的指示》（1963年3月23日—1963年4月1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338—01。
- ⑦ 中国驻苏联使馆《苏联各院校找我留学生谈话阻止散发小册子的情况》（1963年3月28日—1963年4月3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338—03。
- ⑧ 刘道玉《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74页。
- ⑨ 据中方总结报告，中国留苏学生在1963年上半年共散发各种反修材料1万余册。参见中国教育部《1963年留学苏联学生对外工作总结》（1964年2月1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499—03。
- ⑩ 参见中国驻苏联使馆《苏联各院校找我留学生谈话阻止散发小册子的情况》（1963年3月28日—1963年4月3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338—03。
- ⑪ 参见中国驻苏联使馆《苏联各院校找我留学生谈话阻止散发小册子的情况》（1963年3月28日—1963年4月3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338—03。

药味的意识形态斗争观念来忠实地执行来自国内的指示。只是，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即将给自己招致很大的麻烦。

6月27日，苏联外交部以政府照会形式“驱逐”了包括1名留学生在内的7名中国人，理由是他们散发了中共中央6月14日对苏共中央复信的相关材料。^①9月13日，苏联海关边防当局在纳乌什基边境站没收了中苏国际列车乘务员及中国留学生携带的报刊资料，并将列车及全体中方人员武装押解出境。^②而作为对中国留学生参与政治宣传活动的惩罚，苏方的报复行动随即在更大范围内展开。除了进一步加紧业务上的刁难限制外，在政治宣传上，开始公开点名攻击中共及其领导人，严密监视中国留学生的活动，积极推行策反活动，甚至出现直接的人身迫害^③。与此同时，与苏联的反击行动遥相呼应，东欧、蒙古等国纷纷对中国留学生采取限制措施，就留学生的宣传鼓动活动向中方提出交涉，直至拒绝接受双方业已达成的派遣留学生方案。^④

1963年下半年苏东国家在留学生问题上的集体发难对中方形成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一系列驱逐事件的发生，使得中方意识到，在留学生所在国当局已决定采取实质性行动的情况下，如果继续公开从事与学业无关的政治活动，留学生很容易受到来自外交途径的惩罚，但又很难对此加以干涉或采取报复措施，甚至反而会使自身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舆论中处于难堪境地。因此，尽管在公开场合，中方仍在通过各种针对被驱逐人员的高规格接待活动来表达自己的抗议和不满，^⑤但相关部门已开始考虑对留学生对外活动的指导政策加以调整。

1963年9月28日，中国外交部和教育部致电驻苏联、东欧各使馆，指出“反修斗争一定要进行到底，但同当前形势不相适应的做法要改弦更张”，“要在合法斗争的掩护下搞点非法斗争”，因此，要求“留学生一律停止公开散发反修小册子”，“停止公开反修宣传”^⑥。同此时国内正激昂亢奋的批判斗争活动相比，这一指示看起来是矛盾且不合时宜的，但这是在留学生问题上身处窘境的中方领导层为“保留斗争据点”^⑦而不得已采取的自我约束措施。只不

过是自中苏论战以来留学生日趋激进的对苏活动已被要求有所收敛，而留学生承担政治任务的必要性在指示中仍被一再强调，其目的就是“要大家认识到，过去的做法是对的，现在的做法也是对的”^⑧，只是战术和方法发生了变化。而这种“改弦更张”的一个重要方针就是：要将所在国群众，特别是其中的左派力量，作为今后政治工作的主要目标。

将宣传对象按照政治立场或阶层背景加以区分，进而开展工作既是对前期留学生工作经验教训的吸取总结，也是此时中方领导人思路转变的一个反映。在已将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作为明确目标的中共高层看来，“扩充左派力量，坚持做好左派工作”，是“保卫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的核心部分”^⑨。而这一观点反映在指导留学生的活动原则上就是：在苏联人和修正主义当权国家的留学生中，“应根据区别对待的原则，发展和巩固革命力量，争取中

① 参见中国教育部留学生管理司《1963年苏联院校对我留学生态度》（1964年1月2日—1964年4月2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499—04。

② 参见中国教育部留学生管理司《1963年苏联院校对我留学生态度》（1964年1月2日—1964年4月2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499—04。

③ 参见《关于我留学生吴兆霖被殴打事与苏联方面交涉经过》（1963年9月18日—1963年12月2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853—01。

④ 参见中国教育部留学生管理司《关于东欧、蒙古等国对我留学生进行限制的材料》（1964年1月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489—02 《捷克无理要求我召回使馆工作人员及留学生案》（1963年9月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868—01。

⑤ 参见中国教育部《1963年派出留学生大事记》（1964年3月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489—03。

⑥ 中国外交部《纳乌什基事件以后，外交部和教育部发关于当前反修新形势下我留学生对外活动和对外宣传的指示》（1963年9月2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852—01。

⑦ 中国教育部《1963年留学苏联学生对外工作总结》（1964年2月1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499—03。

⑧ 中国外交部《纳乌什基事件以后，外交部和教育部发关于当前反修新形势下我留学生对外活动和对外宣传的指示》（1963年9月2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852—01。

⑨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第367页。

间群众、教育某些受蒙蔽的人，分化和孤立右派”；同时，要积极支持“越南、古巴以及亚非国家中的进步力量”^①。

随着上述指示的迅速传达，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院校的中国留学生支部纷纷调整斗争策略。留学生们在重点联系左派分子的同时，在苏联普通群众中亦开展广泛交朋友活动，通过多种方式与之建立感情。在内容上，逐步减少刻板生硬的意识形态化的宣传，转而以介绍中国建设成就、讲反帝、讲友好为重点。在方式上，则强调通过公开合法的途径，如图片展览、电影、画报等进行宣传。对于亚非拉学生举办的政治活动，只要有利于宣传中方观点和对外政策，都积极参加。除此之外，留学生们还被要求在合法活动的范围内，对苏联政治经济状况、苏共内部矛盾、反华措施和言论、社会群众动态等方面进行调查，以供中国驻苏联使馆及国内进行综合研究。^②

尽管中方留学生主管部门在1963年的留学生对外工作总结中坚称，在该年的斗争中，中方“始终处于主动地位”^③，但尝试利用留学生作为反修宣传工具的意图遭遇挫折却是不争的事实。虽然中方在下半年试图努力扭转不利的工作局面，但实际效果却始终不尽如人意。^④这一结果表明，1960年9月第二次全国留学生工作会议以来形成的相关指导性政策，未能在现实问题上反映出中苏关系的急剧恶化给留学生管理工作带来的挑战，由此导致中方留学生管理层在执行相关决策时缺乏周密思考，并对事态发展估计不足，因而在遭遇对方突然袭击时，猝不及防，只能被动应付。这样，1963年苏东国家留学生工作给中方留下的深刻教训，直接推动了1964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往国外留学生管理教育工作的暂行规定（草案）》（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的出台。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最近三年内留学生管理工作出现的种种问题，1964年的《暂行规定》首次把对留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明确摆在业务学习之前，成为重中之重，而有关组织纪律和对外关系方面的规定则被进一步规范细化。较之先前下发的众多指示，该规定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留学生的学习、生活、对外活动等全

面纳入党的领导和监控之下，特别是要求“留学生必须遵照党和国家对外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每个时期的有关指示，正确处理对外关系”^⑤。

比较而言，1964年的《暂行规定》显然对留学生们提出了更为规范、严格的约束要求。而其中流露出的敌情意识和戒备心理，也是早先历次留学生管理工作会议的指导精神中所未有的。^⑥但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该规定对有关留学生政治任务的事宜却只字未提。就在1964年2月中旬，中国驻苏联使馆留学生管理处在其向上级部门提交的总结报告中还曾指出“留学生的基本任务是学习业务。但对外斗争的任务，也是必须完成的。”^⑦但在《暂行规定》中，此类话语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要求“在对外接触中，应该站稳立场，谦虚谨慎，不亢不卑”，甚至规定“不应该对外国人讲的话，不要乱讲”^⑧。考虑到中方对留学生的指导政策已趋于保守，这一态度的变化自然可以被认为是1963年9月以来有关留学生对外活动指导政策持续调整的一个延续，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国

① 中国教育部《1963年留学苏联学生对外工作总结》（1964年2月1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499—03。

② 参见中国教育部《1963年留学苏联学生对外工作总结》（1964年2月1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499—03。

③ 中国教育部《1963年留学苏联学生对外工作总结》（1964年2月1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499—03。

④ 在1963年下半年的交友活动中，中国留学生的活动成果同上半年形成鲜明对比。在整个莫斯科地区，重点交往的苏联人只有60人，其中还包括20名左派。参见中国教育部《1963年留学苏联学生对外工作总结》（1964年2月1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499—03，第19页。

⑤ 《中央关于派往国外留学生管理教育工作的两个文件》（1963年11月4日—1964年3月1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477—01。

⑥ 参见《中央关于派往国外留学生管理教育工作的两个文件》（1963年11月4日—1964年3月1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477—01。

⑦ 中国教育部《1963年留学苏联学生对外工作总结》（1964年2月1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499—03。

⑧ 中国教育部《1963年留学苏联学生对外工作总结》（1964年2月1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499—03。

内此时对留学生的政治宣传价值似乎也失去了兴趣。特别是到了1964年，派往苏联的留学生仅有区区3人^①，继续从事对外宣传活动的客观条件已逐步丧失。而对于所剩无几的“处在国际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环境中”的留苏学生来说，如何确保他们不再受到“帝、反、修”的侵蚀已成为更为现实的问题。由此出现的一个结果是，1964年中国政府在有关留苏学生的交涉上表现出少有的克制，尽管这一时期由苏方制造的摩擦事件仍时有发生，但中方已很少作出激烈的反应，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让步和配合。^②事实上，作为维持两党两国关系的一个表现，留学生交流此时更多的只是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内容而存在。

二

进入1965年，围绕着对越南问题主导权的争夺，新的冲突开始在中苏关系的裂痕中持续加大。尽管中国领导人早在1962年就已提出同修正主义在国际斗争中争夺领导权的具体方法，是“集中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支援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③，并从1964年起率先作出援越抗美的积极姿态，但1965年莫斯科三月会议的召开却使得苏共以国际共运领袖的身份率先举起援越反帝的大旗。由此，陷入被动的中共反应激烈，在对三月会议大加挞伐的同时，迅速展开对苏共新一轮的意识形态斗争。

就在莫斯科三月会议期间的3月3日，莫斯科各院校的越南学生会邀请中方留学生参加为抗议美国轰炸越南的暴行而组织的游行示威。中国驻苏联使馆本着支持越南斗争的精神予以批准。^④4日下午，聚集在美国驻苏联使馆门前的示威学生用随身携带的石块、弹弓、墨水瓶等袭击使馆建筑，并与使馆外维持秩序的苏联军警发生冲突。其间，有大批学生受伤或遭逮捕，其中包括30余名中国留学生。消息传回国内之后，中方很快从这一突发事件中觉察到有利信息。3月5日，外交部在呈报中共高层的急电中建议“抓住这个事件做点文章，揭露苏修假反帝假支持的真面目”^⑤，并迅速拟订了计划和措施。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利用这一机会大造声势，是抵制莫斯科三月会议，争取越南、

朝鲜等国支持，进而在国际舆论范围内掀起对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攻势，改善自身不利处境的有力举措。于是，一段时期以来已归于沉寂的中国留学生再次被推上了中苏冲突的风口浪尖。

3月4日的事件发生之后，为争取斗争主动权，中国驻苏联使馆立刻于3月5日向苏方提出严重抗议，但遭到对方的拖延回避。中国驻苏联大使潘自力遂于3月6日约见苏联外长葛罗米柯，正式提出抗议照会。而根据相关的安排和准备，新华社、全国学联等机构也随之被动员起来，以各自的形式制造向苏方施压的舆论氛围。^⑥当然，对于中方来说，此时最为有力的斗争武器是冲突的直接参与者——中国留苏学生。只有当这些年轻学生们的不幸遭遇“成为举世瞩目的对象”^⑦时，才能为“苏共新领导的一次大暴露”^⑧提供确凿的证据。因此，

① 参见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第224页。

② 参见中国驻苏联使馆《苏方扣留我留学生等所订报刊事》（1964年9月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496—02；中国驻苏联使馆《苏联要求我驻苏使馆交还列宁格勒留学生租用的住宅事》（1964年8月5日—1964年9月1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503—01。

③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第366页。

④ 参见中国驻苏联使馆《外交部关于苏联镇压反美示威游行、逮捕和打伤我留学生事件的请示报告》（1965年3月3日—1965年3月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984—02。

⑤ 中国驻苏联使馆《外交部关于苏联镇压反美示威游行、逮捕和打伤我留学生事件的请示报告》（1965年3月3日—1965年3月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984—02。

⑥ 参见中国驻苏联使馆《外交部关于苏联镇压反美示威游行、逮捕和打伤我留学生事件的请示报告》（1965年3月3日—1965年3月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984—02；中国外交部：《我全国学联就苏联警察镇压反美示威的留学生事给苏联政府的抗议电和苏大学生理事会给我全国学联的信》（1965年3月7日—1965年3月2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2859—03。

⑦ 中国驻苏联使馆《就苏联镇压学生示威问题外交部的通报和驻苏使馆工作总结》（1965年3月6日—1965年4月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984—06。

⑧ 中国驻苏联使馆《就苏联镇压学生示威问题外交部的通报和驻苏使馆工作总结》（1965年3月6日—1965年4月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984—06。

在接下来的斗争中，中方领导层一方面坚持将受伤学生送入当地医院进行治疗，以表明苏方“残暴镇压”的事实^①，从而争取外界的同情，另一方面则布置留苏学生会联合其他国家学生向苏联外交部提交抗议书，并组织慰问各国受伤和被捕的学生^②，以扩大该事件在国际上，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影响。而这一工作的首要目标就是冲突受害者中的越南学生。

可以肯定的是，从冲突爆发伊始，中方就急切地盼望在对苏斗争的问题上能够得到越南方面的支持或配合。因此，中方相关部门从一开始就要求将拟对苏联采取的措施及时通报给越方^③，并在第一时间积极同越南驻苏联外交人员进行接触和交换意见^④。中方试图使越方形成这样一种观点，即发生在莫斯科的流血事件证明苏联在援越抗美问题上并非真心实意，苏联修正主义者随时可能会背叛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因此“反帝必须反修”。尽管越方外交人员通常都会耐心倾听中方带有暗示的劝解，并在口头上尽量予以附和，但柯西金在2月对河内的访问显然促使他们需要更多的现实问题。在潘自力于5日晚拜会越南驻苏联大使时，越方大使表示，在接到国内指示前，不拟采取行动；此外，越方始终不愿透露受伤学生的具体数字，并不断缩小受伤人数的规模。^⑤5月8日，越南副外长阮基石又向中方告知：关于苏联军警殴打学生事，越方已向苏联外交部提出抗议，但只是内部性的，不予公开。^⑥

越方的暧昧表态显然不是中方所希望看到的。而要求留学生们开展的工作同样也陷入困境。根据安排，中国留苏学生会于3月5日即组织莫斯科各校中国留学生深入受伤越南学生的宿舍进行慰问，并从中了解各国学生受伤人数、情况，以酝酿发动各国学生进行的抗议活动。^⑦尽管在多数情况下，越南学生并不介意在同中国学生的交谈中流露出对苏方粗暴行为的不满^⑧，但当话题涉及中方意欲采取的实际行动时，越方态度立刻会犹豫起来，并在搪塞敷衍之余表示其“处境很困难”，“需要冷静”^⑨。3月6日，莫斯科大学越南学生会前主席在慰问中方受伤学生时，进一步解释说：越南同中

国的处境不同，其最主要的任务是反对美帝，中国国家大，力量强，“在反修斗争中起着重要作用，讲话可以直截了当”，越南就不能这样。^⑩经过两天的频繁接触，越南留学生对于中方有关联合抗议的建议始终避实就轻，并不断强调其他国家的学生也不愿意参加抗议活动。面对这一现实，中国驻苏联使馆不得不承认“发动

- ① 中国驻苏联使馆《就苏联镇压学生示威问题外交部的通报和驻苏使馆工作总结》（1965年3月6日—1965年4月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984—06。
- ② 参见中国驻苏联使馆《外交部关于苏联镇压反美示威游行、逮捕和打伤我留学生事件的请示报告》（1965年3月3日—1965年3月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984—02。
- ③ 参见中国驻苏联使馆《外交部关于苏联镇压反美示威游行、逮捕和打伤我留学生事件的请示报告》（1965年3月3日至1965年3月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984—02，第12页。
- ④ 参见中国驻苏联使馆《越南对苏联军警镇压留苏学生反美游行事件的态度和越南留学生在在此时间中受伤情况》（1965年3月5日至1965年3月1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628—04，第86页。
- ⑤ 参见中国驻苏联使馆《越南对苏联军警镇压留苏学生反美游行事件的态度和越南留学生在在此时间中受伤情况》（1965年3月5日至1965年3月1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628—04，第88、89页。
- ⑥ 参见中国驻苏联使馆《越南对苏联军警镇压留苏学生反美游行事件的态度和越南留学生在在此时间中受伤情况》（1965年3月5日至1965年3月1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628—04，第94页。
- ⑦ 参见中国驻苏联使馆《关于组织各国留学生就苏联镇压示威学生向苏外交部提抗议书及越南留学生的态度》（1965年3月6日至1965年3月2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985—03，第1页。
- ⑧ 参见中国外交部《就苏联镇压学生示威问题外交部的通报和驻苏使馆工作总结》（1965年3月6日至1965年4月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984—06，第131页；中国驻苏联使馆《越南对苏联军警镇压留苏学生反美游行事件的态度和越南留学生在在此时间中受伤情况》（1965年3月5日至1965年3月1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628—04，第96页。
- ⑨ 中国驻苏联使馆《关于组织各国留学生就苏联镇压示威学生向苏外交部提抗议书及越南留学生的态度》（1965年3月6日至1965年3月2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985—03，第2页。
- ⑩ 中国驻苏联使馆《越南对苏联军警镇压留苏学生反美游行事件的态度和越南留学生在在此时间中受伤情况》（1965年3月5日至1965年3月1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628—04，第92页。

联合抗议的条件尚不具备，难于实现。”中国外交部亦于10日同意：停止此项活动。^①

对于中方来说，计划中的联合抗议活动的被迫中止，显然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挫折。中方发现：中国留学生们在“越南同志、亚非拉各国学生、苏联群众以及其它一切要革命要反帝的人”中进行的宣传、揭露工作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这些原先设想的“革命力量”往往对于“反帝必须反修”的道理熟稔于口，但对“站出来揭露、反对苏修”的行动却是推诿再三。^②由此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中方急于做出的激烈反应，非但没有成为鼓舞各方参与斗争的旗帜，反而使自己孤立起来，成为苏方接下来要集中力量进行打击的靶子。

苏方起初对于中方趁机发动的舆论攻势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3月6日，葛罗米柯在会见潘自力时，曾极力否认中国学生的受伤同苏联警察有关，甚至辩称其是受惊的马匹所致。^③在中方提出公开抗议后，苏方的宣传活动曾一度将矛头同时指向中国和越南留学生，对其“流氓行为”进行大肆攻击。^④但苏方很快发现这一做法实际上正中中方下怀。于是，莫斯科各学校的官方口径迅速发生转变，在传达指示中纷纷改称“越生未扔东西，是中国学生领头与警察冲突”，并在与越南留学生的谈话中表示，越南留学生是好的，但游行队伍中有流氓（实际指中国留学生——引者注），^⑤希望越南留学生不要宣传此事。

苏方的分化拉拢对策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从3月8日后的情况看，越方对于中国留学生的态度愈加冷淡，拒绝提供受伤越南留学生的姓名、住址，甚至对中国留学生的探望活动亦多有排斥心理。与之相应的是，中国留学生对越方的消极斗争态度也表露出明显的不满情绪。^⑥随着中越双方关系中出现的这种微妙变化，对于苏方来说，集中力量对中方的“挑衅运动”展开反击的时机已经成熟。除了官方媒体和莫斯科各基层单位连日来普遍进行针对中国留学生“流氓行为”的广泛宣传外，沉默许久的苏联外交部亦于3月12日向中国驻苏联使馆递交答复照会，断然拒绝了中方的抗议，并以倨傲的口气抨击了中国试图教训苏联如何进

行反帝斗争的行为，还若有所指地暗示，苏联一向是用实际行动而不是在口头上支持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斗争。^⑦而苏方更为直接的报复措施则指向中国留学生。

自3月4日起，特别是苏方照会公布后，苏联安全部门对参与游行示威活动的中国留学生的监控大大加强。^⑧莫斯科各院校也对中国留学生采取了种种控制手段：或在专业学习上施加压力，给予种种限制；或加重业务学习负担，限制留学生行动；还动辄以取消学习资格、不予通过考试相威胁；甚至直接剥夺留学生的实

① 参见中国驻苏联使馆《关于组织各国留学生就苏联镇压示威学生向苏外交部提抗议事及越南留学生的态度》（1965年3月6日至1965年3月2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985—03，第1、25、27页。

② 中国外交部《就苏联镇压学生示威问题外交部的通报和驻苏使馆工作总结》（1965年3月6日至1965年4月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984—06。

③ 参见中国驻苏联使馆《我驻苏联使馆就苏镇压反美示威游行、逮捕和打伤我留学生事向苏外交部提出抗议》（1965年3月5日—1965年3月6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984—01。

④ 参见中国驻苏联使馆《关于组织各国留学生就苏联镇压示威学生向苏外交部提抗议事及越南留学生的态度》（1965年3月6日—1965年3月2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985—03；中国驻苏联使馆《苏联对我留学生游行及受伤事的态度和做法》（1965年3月6日—1965年3月1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985—04。

⑤ 中国驻苏联使馆《越南对苏联军警镇压留苏学生反美游行事件的态度和越南留学生在在此时间中受伤情况》（1965年3月5日—1965年3月1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628—04；中国驻苏联使馆《关于组织各国留学生就苏联镇压示威学生向苏外交部提抗议事及越南留学生的态度》（1965年3月6日—1965年3月2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985—03。

⑥ 参见中国驻苏联使馆《就苏联镇压学生示威问题外交部的通报和驻苏使馆工作总结》（1965年3月6日—1965年4月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984—06。

⑦ 参见《苏联外交部答复我驻苏使馆关于苏联镇压反美游行学生问题的抗议的照会》（1965年3月1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984—03。

⑧ 参见中国驻苏联使馆《苏联对我留学生游行及受伤事的态度和做法》（1965年3月6日—1965年3月1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985—04。

习机会。^① 对于在示威活动中受伤的中国留学生，苏方更不手软。继3月5日将7名中国留学生赶出医院后，苏方安全部门人员又对继续留院治疗的中国留学生施以暴力，并将他们强行送入精神病房。^② 如同1963年的情形一样，中国留学生们再次承受了中苏交恶所带来的直接后果。这种明目张胆的人身迫害表明：对于苏方来说，中国留生理应享有的基本外交权利和尊严已然不应得到保障。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已成为苏方在必要时用来敲打中方的一群人质。

三

关于留苏学生可能的遭遇及相关安排，中方也曾作过多种设想和准备。中国驻苏联使馆在1965年3月5日即已提出将所有受伤学生护送回国治疗的建议。而为了鼓舞越方的斗志，外交部否定了这一意见，坚持将这些学生留在莫斯科的医院治疗。中国驻苏联使馆在对受伤学生进行排查后亦认为“从负伤程度和治疗情况看，目前可不考虑送人回国。”^③ 但是，这一做法很快被修改。随着对亚非拉“革命群众”的失望与日俱增，中国学生成为人质的现实也日趋严峻，特别是在针对受伤中国留学生的暴力行为发生后，中方领导层意识到将受伤留学生继续留下作为反修教材已不现实，而唯有将他们接回国内才能在更大范围内揭露苏方的“法西斯罪行”。这样，经外交部副部长陈毅批示，伤情较重的几名学生于3月12日被要求迅速送回北京。^④

根据安排，当搭乘有4名受伤留学生的飞机于3月14日抵达首都机场时，高教部部长蒋南翔，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乔冠华，以及中科院、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等部门的负责人已率领2000余名学生、群众等候多时。在4名学生被人搀扶或用担架抬下飞机后^⑤，现场的人群“不断地振臂高呼口号，对苏联政府镇压学生反美示威的暴行表示最强烈的抗议”^⑥。此后，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等领导亦陆续前往协和医院，探视受伤学生。^⑦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则被要求对整个过程的编发相关的消息、图片，以扩大宣传。^⑧

同时，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余湛还于3月16日就苏联镇压示威活动和破坏留学生之事，向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提出严重抗议照会，并将照会全文在报纸上刊登。^⑨

中方大张旗鼓的高调举动固然是在向外界显示其姿态，但在这一系列安排背后，还有着更深一层的考虑。自1963年以来，中共领导人对于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危险开始作出越来越严峻的估计。如何将国际反修斗争引入国内，已成为毛泽东等人积极思考的问题。^⑩ 特别是进入1965年后，随着对政治运动和斗争目标的酝酿日趋明朗，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已成为国内政治革命的演习。而对于熟稔群众运动的中共领导人来说，在国内开展这一斗争，同样需要依靠对党内外群众的广泛动员。因此，为了给群众性的反修防修运动做好舆论铺垫，深刻

① 参见中国驻苏联使馆《留苏联学生反美游行后苏方加强对我留学生的控制》（1965年3月20日—1965年3月2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2859—02；中国驻苏联使馆《苏联各界对苏军警镇压外国在苏留学生反美游行的反应》（1965年3月7日—1965年3月2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628—02。

② 参见中国驻苏联使馆《驻苏联使馆对我受伤学生采取的措施、外交部的复电及我留学生伤情报告》（1965年3月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985—05。

③ 中国驻苏联使馆《驻苏联使馆对我受伤学生采取的措施、外交部的复电及我留学生伤情报告》（1965年3月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985—05。

④ 参见中国外交部《关于欢迎我4名重伤学生从苏联回国事》（1965年3月12日—1965年3月1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985—02。

⑤ 根据苏方材料的说法，这4名中国学生在登机 and 路程中并无特殊护理的需要，一切正常。

⑥ 参见《人民日报》1965年3月15日。

⑦ 参见《人民日报》1965年3月16日，1965年3月17日。

⑧ 中国外交部《关于欢迎我4名重伤学生从苏联回国事》（1965年3月12日—1965年3月1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985—02。

⑨ 参见中国外交部《外交部苏欧司余湛司长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递交抗议照会》（1965年3月14日至1965年3月16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984—04。

⑩ 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733页。

揭露苏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叛变行径，将有效地激起群众的斗争热情，而中国留学生们在莫斯科的悲惨遭遇及其表现出的斗争精神，无疑是极具说服力和鼓舞性的。

苏方对中国国内发生的一切也表示出严重关切，但他们的外交抗议并不能阻止敌视苏联的浪潮在中国国内的持续蔓延。随着中方宣传鼓动的进一步深入，中国国内的反苏氛围日渐浓厚。自3月4日的事件及其后续交涉过程被中国官方媒体连篇累牍地公布以来，苏联驻华使馆开始陆续收到大量来自中国各地的抗议信件。愤怒的中国群众在信中甚至提出要消灭苏联领导人，说苏联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法西斯国家。带有侮辱性和威胁性的挑衅电话也接连不断地出现。甚至连少年儿童也加入到反苏运动的队伍中。^① 当契尔沃年科要求中方阻止这些“令人不安”的现象时，余湛毫不犹豫地予以回绝说：中国政府“不会制止群众表达正义的呼声，革命的呼声”^②。在中方看来，广大群众被点燃的革命斗志不仅令国际修正主义者胆战心惊，也为即将到来的狂热的全民政治运动制造了氛围。

1965年3月4日的事件对于中国的留苏学生政策导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根据中国国内和驻苏联使馆最初的部署，中国留学生们的主要任务是在越南、亚非拉学生中进行广泛宣传，争取和团结共同斗争的同盟军。在这一希望落空后，中国驻苏联使馆曾组织留苏学生将工作对象转向苏联群众，试图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予以团结和教育。^③ 但随着苏方宣传机器的开动，苏联国内舆论中很快出现不利于中国留学生的倾向。在留学生所在的莫斯科各单位，越来越多的苏联群众对中国留学生表现出冷淡和不满，围攻和指责他们的事情也时有发生。^④ 这一情况的出现，加之苏方持续打压的现实，使得中方不得不考虑继续在苏的中国留学生愈发艰难的处境。由此，中国外交部于3月21日提出：中国留学生的活动“不宜突出”，不要走在越南留学生前面，在巩固阵地的前提下应转入正常学习。^⑤ 依照这一精神，中国驻苏联使馆迅速拟订了《对当前留苏学生工作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认

为“三月四日事件证明，只要我们搞反美斗争，苏修总是要把打击目标集中在我们身上的”，因此，要“更加注意讲究策略”，在支持越南反美斗争的问题上，中国学生不搞突出。^⑥ 关于下一步留学生工作的开展问题，中国驻苏联使馆提出了坚持、巩固阵地的原则，否定了中国留学生在前一阶段斗争中出现的“大干一通光荣回国”的思想，要求他们停止以同学的名义向苏联当局提抗议，并在进入正常学习的情况下搞好与导师、同学的关系。^⑦

这一《意见》很快得到外交部和高教部的批准。这表明：中国政府在对内仍表现出强硬姿态的同时，却又不得不出于保护留学生的目的，而在对苏交涉中重新变得谨慎起来。但不管怎样，中方的这一决定终于使得中国留苏学生们的求学历程出现了回归正常的转机，尽管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到了3月底，当在莫斯科的越南留学生联络中国留学生，并酝酿再次进行游行示威时，中方的回应是：如果不

- ① 参见中国外交部《外交部苏欧司余湛司长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1965年3月1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984—05。
- ② 中国外交部《外交部苏欧司余湛司长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1965年3月1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984—05。
- ③ 参见中国驻苏联使馆《关于组织各国留学生就苏联镇压示威学生向苏外交部提抗议事及越南留学生的态度》（1965年3月6日—1965年3月2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985—03。
- ④ 参见中国驻苏联使馆《苏联各界对苏军警镇压外国在苏留学生反美游行的反应》（1965年3月7日—1965年3月2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628—02。
- ⑤ 参见中国驻苏联使馆《关于组织各国留学生就苏联镇压示威学生向苏外交部提抗议事及越南留学生的态度》（1965年3月6日—1965年3月2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985—03。
- ⑥ 参见中国驻苏联使馆《驻苏联使馆就留苏学生反美游行问题的请示和外交部的批复》（1965年3月5日—1965年4月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2859—01。
- ⑦ 参见中国驻苏联使馆《驻苏联使馆就留苏学生反美游行问题的请示和外交部的批复》（1965年3月5日—1965年4月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2859—01。

由越南留学生领头出面，中国留学生则拒绝参加。^①这种与国内政治氛围相反的谨慎做法凸现出一个事实：3月4日的事件以来的教训对中方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以至于最终使其彻底放弃将中国留学生继续置于反修斗争最前线的念头。只不过在做决定的同时，中方已经注意到中国留学生们显露出的另一种巨大的政治价值，即他们的经历在国内引发的强烈反响。

因此，1966年10月，当被苏方限期离开的最后65名中国留学生返回国内时，这些“光荣的反修战士”立刻受到最热烈的欢迎。从11月2日他们抵达北京起，由成千上万的普通群众及红卫兵参加的盛大欢迎仪式将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狂热的气氛中。随后，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代表毛泽东对他们的慰问以及为此在工人体育馆举行的万人集会则使得中国国内的反苏情绪愈加高涨。^②到了1967年1月，当从莫斯科传回在红场给列宁、斯大林墓献花的中国留欧学生再次与苏联军警发生冲突的消息后，中国国内立刻掀起对苏联最为猛烈的批判。1月18日，在苏联驻华使馆外出现了声势浩大的暴力示威游行。使馆的大门和围墙被糊满了大字报和标语，架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对着使馆一遍遍地播放着抗议书和反苏口号，甚至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模拟像也被吊在使馆门上和门前的大树上示众。同日，全国各主要城市和解放军驻地也举行了相应规模的抗议集会和游行。^③至此，中方借助欢迎中国留学生的声势，将全国反修斗争的浪潮推上了最高峰。

结 语

当毛泽东于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对中国留学生们说出那段著名的勉励话语时^④，没有人能够预料到国家寄托在这些年轻人身上的厚重

希望，最终会演变为针对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斗争指示。在中苏关系走向恶化的岁月里，留学生们必须优先服从反修宣传活动的需要，而不是自己的学业。但从本质上说，他们的身份依然是学生。其个人素质以及所处的环境决定了他们并不适合从事这种与专业学习没有关联的政治斗争活动。而这也是中方利用留学生在“修正主义堡垒”内部开展的反修活动屡遭挫折的重要原因。其结果非但没能实现所谓“以斗争促团结”的愿望，反而将本已剑拔弩张的中苏关系进一步推向敌对的边缘。尽管在国内的宣传口径中，留学生们的这些活动同崇高的政治使命实现了联系，但它毕竟违背了派出留学生的初衷。同50年代中苏“蜜月期”间前往苏联学习的前辈们相比，60年代高举反修大旗的留苏学生尽管被赋予极高的政治荣誉，但他们所失去的不仅是一段本该美好的人生经历，而且是一次以学识报效国家的人生机遇。

(本文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11级博士生 上海 200241)

(责任编辑 王志刚)

① 参见中国驻苏联使馆《驻苏联使馆就留苏学生反美游行问题的请示和外交部的批复》(1965年3月5日—1965年4月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2859—01。

② 参见《人民日报》1965年11月2日、11月5日。

③ 参见《人民日报》1967年1月29日。

④ 即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见中国留学生、实习生时的讲话，原话为“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见朱训主编《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忆留苏岁月（下编）》，第437页。